

陶淵明集

陶淵明集

王 瑤 編 注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封面题字：黄苗子

装 帧：古 干

陶渊明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城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7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7}{8}$ 插页 2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湖北第8次印刷

印数 117,001—150,000

书号 10019·631

定价 0.50 元

松溪

採菊

東籬下

悠然見

南山

古干

首子

圖



前言

一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曾对后来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生在东晋后期（三六五—四二七），从少年起就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纷扰，所谓「弱冠逢世阻」，后来由出仕到归隐，更遇到了晋宋易代的变迁；他对当时的政治是很不满的。那时正是一个门阀势力巩固统治的社会，士庶的界限非常严格，历史上关于当时区别身分门第的故事，以及高门大族出身的文人们的玄谈风气和豪奢习尚的记载，都是非常之多的。渊明虽然也出身于士族，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之类的官，思想上也有许多与当时士族文人相同的地方，但他同当时掌握实际统治权力的高门巨族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他固然也可以出仕，而且实际上也出仕过四五年，但最多也只能得到参军、县令这样的职位，而且还得叹息「求之靡途」；这正如和他常常周旋的一些人也是主簿、参军之类的掾属佐吏一样，那虽然也是一些官吏，但和当时高门巨族出身的人物究竟是很不相同的。他是否陶侃的后裔现在尚未论定，但陶侃也是出身寒微，以武功致贵的；对渊明的地位并无影响。因之在那个门阀统治的社会里，他的处境是很难在仕途上求发展

的。加以中年屡经丧事，又遭火灾，「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的确很困苦。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卑劣和腐败，「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他宁愿归隐和种田。他也鄙视那些士族们的腐烂豪奢的生活。「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可见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也反对那种不劳动而坐享其成的生活。这种种情形就使得他与当时一般士族文人的生活间有了距离，而和农民之间倒有了「共话桑麻」的可能性。在他开始躬耕的时候，他还可以「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那主要的用意似乎还在「庶无异患干」；到后来便「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了。到晚年「旧谷既没，新谷未登」的时候，更感到饥饿之患了。这就是说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不只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相当缩小，他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在农村生活的体验中有所改变。这是陶诗的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他除歌颂过「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自然景色外，也歌颂过劳动和劳动人民。「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不能不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农民从事劳动的真实感情。「农务各自归，閒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他和农民的交往中也有一种真诚的情感。就因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一定时间、程度上他自己也是参加劳动的。这种生活内容就使得他的诗无论在内容上或风格上都与当时一般作风有了不同的表现，使他的作品有了独特的光辉。

鲁迅先生说：「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对政治是极关心的。萧统《陶渊明集序》说陶诗的特点就在「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集中除《述酒》一篇外，说到当时政治时事的地方还有好多，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怀抱和态度。不过也有很多注家过分滞执于他对晋室衰亡的忠愤，例如明黄文焕的《陶诗析义》，好象每首诗都有托讽，那也是不对的。渊明固然不满意刘裕的行为，对晋室也有相当的依恋，但他归田隐居之时距晋亡尚有十五年，是不可能简单地用忠于晋室来解释的。由作品中就可知道，他是有所反抗和批判的，但那对象主要是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市朝显达，刘裕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他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他对现实感到不满，但又无力反抗，因之就逃避归隐了。这在他思想上当然不能没有矛盾，而且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他虽然也想「无复独多虑」，「聊乘化以归尽」，但事实上却只是「履运增慨然」，这正反映了他对世事是不能冷淡和忘怀的，而消极归隐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他思想中的矛盾。渊明的饮酒就正是因为这个矛盾无法解决而勉强采取的一种消极逃避的手段。「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他是很关怀现实的，也是很痛苦的，但「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无可奈何就只有用酒来逃避和麻醉了。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饮酒是陶诗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这原因都可以用「意不在酒、寄酒为迹」来说明，从集中歌咏饮酒的诗句来分析，就更清楚。「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这说明了他饮酒是为了逃避，借酒来韬晦免祸的。即使别人对自己有劝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独醉，自然彼此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这正和锺会问阮籍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一样。如果对方发觉有甚么错误的话，「君当恕醉人」，也可请求别人的谅解。从这方面讲，他的饮酒是为了退隐和逃避。如果逢着甚么「念之心中焦」的事，他就「浊酒且自陶」一下。另一方面，「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这是写饮酒之乐的，是一种小有产者满足于现实生活的情趣，也就是一种安于现状的麻醉。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变革，而且也看不出可以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消极的「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那么由此而自甘寂寞和安于现状，正是由洁身自好的退隐发展下来的必然结果。锺嵘《诗品》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居虽然只是一种由个人出发的逃避，但也带有一定的对统治者的反抗意义，这也就是历代人民对一些隐士的气节还能发生敬佩的原因。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一些例如「终南捷径」式或「山中宰相」式的隐士，但陶渊明的隐居显然不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那一类，这是可以由他的事迹和作品来证明的。因此，他的隐居虽然和他的饮酒一样，也是一种逃避，但那的确是含有不满当时统治阶层的意义在内的，是中国传统的重正义尚气节的行为的好的一面的继承。因此不只

他的「文体省净」的诗可以当得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在对他所不满意的统治者毅然不合作的实际行为上也是如此。

他早年本来并不是象后来那样消极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是希望能够建立功业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同时也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出仕过一个短的时期以后，现实终于使他感到了「违己交病」，于是便选择了退隐归耕的道路，他所歌颂的理想人物也就成了长沮桀溺了。这在他本来是条不得已的道路，「时乖运见疏」，「自余为人，逢运之贫」，感慨是很多的。但他对当时的仕途非常鄙视，如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纤辔诚可学，违己诟非迷」，又说「市朝驱易进之心」，他把自己同这些人的界限是划得很清的。「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他自己的生涯遭遇和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都使他选择了一条洁身自好的退隐的道路。

他对政治是有理想的，《桃花源诗并记》的材料虽然有当时实际传闻的根据，但他的确是把它当作社会理想来描写的。那是一个与现实社会远隔了的，没有现实中种种扰乱与贫困的所在，「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正是《老子》中所写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诗中也有同样的表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就因为他不满意当时一般仕宦者的虚伪和人民的贫困，他才希望能有

一个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大家都「怡然有馀乐」的社会。他把这个理想来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中，在那里，绝没有那种他所讨厌的人物，所有的都是农民，但又不像一般农民，他们都有一种悠闲高旷的情趣，每个人都有点像陶渊明自己，这就是他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和他的社会地位、生活情况，都是合拍的。而且也多少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理想，「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也正是农民在当时所可能有的现实要求吗？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和当时在上层士大夫中流行的老庄哲学是很有关系的，从作品中看来，他自己的思想所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就很大，但他关心时事，自营衣食，反对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神不灭论」，认为「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的思想也有一大部分是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而这也正是使他的作品发生光彩的重要原因。

二

正因为他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经历过的田园生活，并且参加了「躬耕」的实际劳动，遂使得他的诗也有了与当时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鲜真实的内容。田园生活本身是朴素的，自然的，他在这样的生活中自然会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和触发，在亲身参加劳动以及与劳动人民生活的接近中，渊明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陶鎔和洗炼，因此就使得他虽然处在一个崇尚骈俪的文学作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而仍能形成一种单纯自然的新颖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田园

生活的本色的表现。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这类近于口语的句子，像「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这类近于歌谣的句子，在那个时代都是非常突出和特殊的，而这种艺术上的单纯自然的特色却正是他长期体验生活的结果。这种情形我们也可以拿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明，「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的确是他的写照。他的诗在后来的虽然发生的影响很大，但在当时却简直没有人注意。晋末的诗人，大家举殷仲文、谢混，同时代由晋入宋的诗人，江左并称颜、谢，都不论及渊明。钟嵘《诗品》仅列之为中品，而文学批评的专著《文心雕龙》，历评以往各代著名文人，竟无只句涉及渊明。此外如沈约《宋书》，只把他列在《隐逸传》，而于《谢灵运传》后作长论以阐一代文风，其中也没有说到渊明。《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晋宋各史传，都没有论到陶诗。如果说他在当时还有一点为人重视，也只是为了他的行为，而不是为了他的诗。《文选》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中，有拟他的一首，《诗品》列之为中品，才算开始有人注意到他的诗，但一则题为「田园」，一则评为「隐逸诗人之宗」，评价都不算高，最多也只承认他一方面有成就。直到梁昭明太子编集作序，采他的诗入《文选》，渊明才在文学史上有了一个较高的地位，但离东晋已经过三个朝代了。为甚么陶诗在当时这样不受人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人微地轻。在那个重视门阀地位的社会里，诗文只是市朝显达的专用品，像他这样一个日渐沦落的小有产者，是不会被人重视的。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五年（四八七），距渊明卒年（宋元嘉三年，四二七）仅六十载，但传中对他的名字已有了「或说」的疑问，

就可证明他在当代地位身分之寒微了。更重要的，因为文化是掌握在高门大族的手里，他们的生活和对于诗的要求都和陶诗的单纯自然的风格不合拍，因此像谢灵运的富艳难踪的诗体，当时可以蔚为风气；「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雕琢，也可以为当世所竞；而陶诗则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根本田园生活在当时就认为俚俗，不可以入诗；那是和高人隐士们所欣赏、所栖隐的「山水」有区别的。谢灵运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这不同就是雅俗的分界。

譬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就是在「昔山浚湖，穿池植援，出入群从，结队惊众」的情形下写成的；而且屈柄笠、谢公屐，豪华远达京都，邻郡疑为山贼，这都不是渊明所可比拟的。渊明归田后虽然也因遇火等事屡经移居，但无论上京或南村，栗里或庐山，总之是足迹没有出过百里，他只是固定地生活在那种朴素平淡的农村里，而这就决定了陶诗的单纯自然的独特的风格。像会稽永嘉的名山水是可以富艳雕琢的笔调来绘声绘色的，而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那种农村生活却只能用单纯朴素的笔调去写，这就形成了他与当时一般文人们的风格的不同。但「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是当时一般的风气，因为这也同样是为高门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所决定的，因此谢灵运可以开一代文风，在当时享极高的盛名，而渊明的诗却和他在当时的生活以及社会地位一样，是「枯槁」的。这说明了他和当时一般士族文人之间存在着长远的距离，而这也同时就是他比较接近人民生活的伟大的地方。

但陶诗对于后来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这可以拿历代为陶诗作注释的人之多来作证明，中

国诗人中除杜甫外，几乎再没有像他这样为历代人们所注意的了。因为时间久了，蕴藏着的光辉是总会为人所发现的；陶诗之长久被人欣赏，就充分地证明了他的作品的伟大。因此对于后来的影响也特别大，差不多那一家的集子里都有歌颂渊明的诗句。杜甫《可惜》诗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白居易《题浔阳楼》诗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至于李白的歌咏饮酒，苏轼的逐篇和陶，那更是显而易见。一直到晚清的黄遵宪还把他的诗集叫做《人境庐诗草》呢！清沈德潜《说诗碎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有其閒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我们仅举这一段话也就足以说明陶诗在文学史上所发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了。一个诗人的作品为历代诗人所推崇，为历代人民所欣赏，那就已经证明他是经过长时期的考验，为读者所批准了的；而他的作品也就必然含有一定的符合人民要求的内容和优美的艺术上的特色。

当然，那些欣赏或祖述陶诗的人也并不一定就都能欣赏陶诗的独特优点，其中也有好些人倒是只就他们所喜欢的某些消极方面来加以突出和夸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陶诗中本来也有它消极的一面，他把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比较平和冲淡，像《述酒》诗就用瘦词写得那么隐晦，而对一种安于现状的生活情趣却有时倒写得真是「不乐复何如」；而且对隐士的赞美，对晋室的依恋，安贫乐道，及时行乐，这一切都说明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是有一些消极成分的。而

另一面，更因为那些后世的封建士大夫文人们本来也只能欣赏这些消极的地方，结果就专门夸张了这一部分，并以这种夸张来作为陶诗的全部精神，加以提倡和鼓吹；这种影响就很不好，其实这无异是有些曲解了陶诗。鲁迅先生就慨叹过「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同时他又指出了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这种脱离原作真实而片面夸张的加以抑扬的人，就多半只能得到他作品中的消极部分，而且就连这一部分他也是要歪曲了的。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望）南山」的诗，本来也不过是说采菊服食、希求长寿的意思，并没有甚么超然静穆的境界如一些论客们所赞赏的那样，但经后人一再地引伸和夸张，于是便把陶渊明歌颂成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逸静穆的理想典型了；其实这正是曲解了陶诗的。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七））。这不只说明了以前有些昏聩的人对渊明的赞赏是错误的，而且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全面细致地联系当时史实来读他的作品时，那他仍然是很伟大的。

三

鲁迅先生又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这话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古典文学遗产时的重要指针。为了在阅读和认识中不犯主观片面的毛病，根据历史状态来研究作者的全人，自然是较为确凿的；而对陶渊明这样一位历来对他有过许多模糊认识的诗人，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显得更为重要。陶诗的数量本来也不多，这本书虽然是为了普及来介绍给一般读者看的，但我们仍然没有加以删选，而且除诗外还把辞赋杂文也附在后面，以供读诗者的参考；也就是觉得这样能够顾及作者的全人，使读者可以扫除一些以前所得到的不太正确的印象，而对这样一位卓越的诗人能够有全面确凿的了解。因此也依照旧本，仍将萧统所作的《陶渊明传》附在前面，并略加注释，以供读者查阅渊明生平事迹的参考。

《陶集》自宋元以来，刊布甚多，加以评注屡出，因此版本也有很多种。大致说来，梁以前是《陶集》的传写时期，宋以前是补辑时期，两宋为校订付刻时期，南宋及元为注释时期，明朝为评选时期，清朝为汇集和考订时期。不过这只是就一般风尚而言，并非没有例外。就现在流传各本的编排情形说，因为大致直接间接都是出自北宋的宋庠本，以后辗转刻印的，因之编排次第也并无多大差别。集中四五言诗共占四卷，其中第三、四两卷略有编年痕迹，其次第当有略近于

原本处。第一卷收四言诗九首，只是按形式分类的，第二卷首列《形影神三首》，大概因为是谈理之作，其余的就是混杂排列了。这就给研究陶诗的人以很多困难，既无法窥察作者一生中思想变化的痕迹，也很难联系当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了解，自然不如将作品按时代前后编年排列，会给读者以更多的方便。清陶澍曾考证《陶集》原来「必有自定之本」，「窃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为序」，又说今本之「其非旧次，亦可见矣。」所论甚确。（《陶靖节集注》卷三）《隋书·经籍志》记有「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又云：「梁五卷，录一卷。」《唐书·经籍志》记「《陶渊明集》五卷」，即梁本而亡其录。可知原来本有目录一卷，至唐才亡，以后遂致凌乱失序，无从勘定了。现在我们要想完全恢复《陶集》原本的编排次序，那当然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编年既对读者阅读和研究有方便，而陶诗中也的确有一部分是标明年代的，那么尽其可能，参照作品内容与当时史实，把作品另按时间编排起来，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事了。当然，既要按时代次序系年，那就无论那一篇都必须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而其中有一部分又的确是很难确定年代的，因此我们虽然也多方探索，给每一篇都系在一个一定的年代上，但对于某些篇说来，也只能说是大致如此，并不敢确定说每篇都是果然如此的。也就是说这样编排只是为了给读者阅读时以比较明确的线索，而并不敢说说这就可以「顿复旧观」。不过既然其中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写作年代是可以完全考定的，那么即使其余的部分在时间上前后略有参差，也还不失为参考之助。因此我们就打乱了原来的次序，另以时间前后来排列了。又因为陶渊明的主要作品

虽然是诗，但旧本《陶集》中除四言诗外，尚有文集六卷。其中除《五孝传》及《集圣贤群辅录》已公认为伪托，应予删削，《桃花源记》已附入《桃花源诗》中以外，其余尚有辞赋杂文十余篇，对读者读诗时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把这些文字也按时间前后排列，编在诗的后面，作为第二部分。

本书第三部分是对作品所加的注释，这也需要略加说明几句。第一，《陶集》的异文向来很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云：「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可见自宋元以来，《陶集》的字就已经有很多讹异了。各本也往往于正文之下，注有「某本作某」等字样，以供读者参考。但本书是为了普及的，与专门研究或校勘之作不同，多列异文，徒增烦扰，并无益处。因此除一二处有必要者注明「一作某」外，其余就只在注释之前，参照各本异文，择其文义妥善者从之，概不多注异文和再解释理由了。第二，陶诗旧注甚多，而且传统作注的人多半很重视文词用事的原始出处，所谓「释事忘义」之类，本书注释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原诗含意和消除语言文字间的隔阂，因此除必要者外，概不注释文词的出处。而且虽然作注时也参考了一些旧注，采用的也相当多，但因为这并非专门学术著作，为避免繁芜，注文中也概不援引旧注者的姓氏和书目。第三，原来的打算是用日常的口语来简洁明了地注释原作品中的一些难解的地方，以便使陶诗能更普及地为多数人所阅读，但用语体文作古典文学注释的工作还正在尝试中，目前还很少成规可循，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又很拙劣，